

# 德国柏林藏清代准噶尔蒙古族部落 首领油画像研究

On the Oil Portraits of Qing Dynasty Dzungar Mongolian Tribal Chieftains Collected in Berlin

王幼敏

Wang Youmin

## 内容提要：

德国柏林藏八幅准噶尔蒙古族部落首领油画像，以往的研究将其认定为与“紫光阁功臣像相关”，或认为是为绘制紫光阁功臣像及大型绘画作品而准备的素材、稿本。然而，笔者的研究显示，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武成殿特别设立油画功臣像，以表彰为国家统一、安定做出贡献的各族部落首领。其中准部有十八人入选，八幅油画像即是其中一部分，功臣像中还包括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人。这一发现填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对于我们今天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不无裨益。此外，本文还就八幅油画像的作者、人物身份、绘制时间以及与故宫博物院藏《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深入、全面的探讨，均取得了新进展。

## 关键词：

清代 油画像 功臣像 王致诚 郎世宁

## ABSTRACT:

The eight portraits of Dzungar Mongolian tribal chieftains collected in Germany wa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works related to the “meritorious officials of the Ziguang Ge” (erroneously translated as Purple Light Pavilion) or drafts prepared for the ambitious project. The author argues, based on studies, that they were among the oil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commission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r.1736-1795) in 1767 at the Hall of Military Achievements (*Wucheng dian*) for the good will of praising chieftains of various ethnic tribes who had contributed tremendously to the empire’s unification and stability. Eighteen chieftains from the Dzungar Mongolian tribes were enrolled then, including Ubashi, who led the Torguts to migrate back to Qing territory. The discovery complements the poorly recorded history, and is instrumental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explores the artist(s), the sitters’ identities, and the date of the oil paintings, 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mparisons of these portraits with *Ceremonial Banquet in the Garden of Ten Thousand Trees* (*Wanshu yuan ciyan tu*) and *On Horsemanship* (*Mashu tu*), two paintings collec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Both the exploration and comparison yield progress.

## KEYWORDS:

Qing dynasty, oil portrait, portraits of meritorious officials, Wang Zhicheng (Jean Denis Attiret), Lang Shining (Giuseppe Castiglione)



图1 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像



图2 都尔伯特汗策凌像



图3 都尔伯特扎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像



图4 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像



图5 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像



图6 绰罗斯公达瓦像



图7 都尔伯特公布颜特格斯



图8 都尔伯特公巴图孟克

## 一 引言

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收藏一批清代油画肖像，其中八幅为准噶尔蒙古族部落首领像。画像均为纸本，尺幅大致相同，纵70厘米，横55厘米左右。画面基本保存完整，只是有不同程度的色彩脱落。画中人物身着清代官服，用满、汉文题写其族属、封号和姓名，分别为：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图1〕、都尔伯特汗策凌〔图2〕、都尔伯特扎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图3〕、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图4〕、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图5〕、绰罗斯公达瓦〔图6〕、都尔伯特公布颜特格斯〔图7〕、都尔伯特公巴图孟克〔图8〕。据博物馆方面的介绍，油画的作者为清代宫廷西洋画家王致诚，绘制时间不一。其中，《根敦像》绘于“1755-1766年左右”（乾隆二十年至三十一年），《巴图孟克像》为“乾隆时期”，其余六幅均为“1755年左右”（乾隆二十年）。至于依据，馆方没有说明<sup>1</sup>。

八幅油画像的相关研究，主要有聂崇正《王致诚的油画作品》<sup>2</sup>《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的油画》<sup>3</sup>、汤开建

1 霍云女士为本文提供了德文材料的中文翻译。

2 聂崇正：《王致诚的油画作品》，《紫禁城》1989年第3期，第37页。

3 聂崇正：《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的油画》，《美术》1990年第10期。

《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sup>1</sup>、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sup>2</sup>。三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第一，聂崇正、汤开建认为八幅油画像均是王致诚所绘；王静灵认为并非王致诚一人所画。其中，《达瓦齐像》《达瓦像》为郎世宁所画，《根敦像》为艾启蒙所画，其余五幅为王致诚所画。

第二，聂崇正认为八幅油画像均绘于乾隆十九年夏，画的是乾隆十九年夏季来归附的准噶尔蒙古族都尔伯特部首领；汤开建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八幅油画像并非王致诚同一时期的作品。其中策凌、刚多尔济、根敦、额尔德尼、巴图孟克、布颜特古斯等六人画像，绘于乾隆十九年夏季，达瓦齐、达瓦像绘于乾隆二十年冬季。

第三，八幅油画像的性质，聂崇正、王静灵认为是稿本，“是为创作《万树园赐宴图》所做的准备工作”。“这些蒙古部族首领的油画肖像，是稍后乾隆皇帝命郎世宁、王致诚以及艾启蒙等制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型绘画《万树园赐宴图》的素材”。

第四，汤开建认为，乾隆曾命王致诚“画平定准部诸将图像约二百张”，现藏于德国柏林的八幅油画像就是这批作品的遗存。

上述观点，除第一项中王静灵认为八幅油画像非王致诚一人所画之外，笔者认为均可商榷。首先，这些画像给人直观的感觉，艺术风格明显不一致，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其次，所绘人物既不像聂氏所说都是乾隆十九年夏季来归的首领；也不像汤氏所说为乾隆十九年夏、二十年冬归附的首领，而是来自四个不同时间段，绘制时间也相应分为四个时期。

其三，油画像应为正式作品。虽然有稿本的功用，但不是主要方面。它们是清代“功臣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与“紫光阁功臣像”一样被摆放在宫廷殿宇中。

其四，八幅油画像既然并非出于王致诚一人之手，汤氏所谓八幅作品为王致诚画“平定准部诸将图像”200幅的遗存之说，自然不能成立。总之，八幅作品背后的因素要比过去的认识复杂得多，它们的绘制时间、作者、人物身份以及性质、功用等都需要重新讨论。

## 二 八幅油画像所涉史事

据清代宫廷档案及多种史料记载，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先后有三批准噶尔蒙古族首领率众归附。为此，乾隆皇帝分别于十九年的五月、十一月，二十年九月三次亲临避暑山庄，举行封赏筵宴，隆重接待。

### （一）乾隆十九年五月，筵宴“三车凌”

准噶尔厄鲁特，又名四卫特拉。部内有绰罗斯、辉特、和硕特、都尔伯特四族，各领其众，而绰罗斯为长。乾隆十七年，厄鲁特发生内乱，征战不断。都尔伯特部台吉车凌不堪动乱之苦，于乾隆十八年五月，率领本部族人归附清朝。乾隆十九年四月，谕旨车凌等入觐。考虑到他们均未出痘（天花），且不耐京城暑热，

1 汤开建：《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196页。

2 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故宫学术季刊》，第34卷，第1期，2016年，第153页。

特安排在相对凉爽的避暑山庄觐见。此次接见活动十分隆重，赏赐颇丰。五月十二日，册封车凌等十三位首领<sup>1</sup>：

车凌，封为亲王；车凌乌巴什封为郡王；车凌孟克、色布腾封为贝勒；孟克特穆尔、班珠尔、根敦封为贝子；刚、巴图孟克、玛什巴图封为公；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封为一等台吉。

此后十天里，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为归附首领举行了一系列筵宴活动，还特意搭盖了戏台，准备了火戏、马仗等节目，并命令宫廷西洋画家王致诚绘成图画以示纪念。此次乾隆皇帝对都尔伯特首领的隆重接待，在厄鲁特内部产生了强烈反响。

## （二）乾隆十九年十一月，筵宴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等

乾隆十九年七月，为达瓦齐所败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乾隆皇帝闻报后欣喜不已，决定缩短在盛京驻蹕的时间接见他们，并指示筵宴、赏赐规格完全比照“三车凌”<sup>2</sup>：

阿睦尔撒纳等召见施恩筵宴、赏赐应预之处，照筵宴车楞、车楞乌巴什物等施恩之例预备。

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皇帝传旨照正月赏过车凌等人的宫廷器物预备亲王一份、郡王二份、贝勒四份、贝子五份、公五份、扎萨克台吉三份<sup>3</sup>。由此可知，此次归附首领人数众多，原拟封赏二十人。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再一次来到避暑山庄。十二日，加封阿睦尔撒纳等封号<sup>4</sup>：

阿睦尔撒纳封为亲王，讷默库、班珠尔封为郡王；杜尔伯特台吉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辉特台吉札木参、齐木库尔为贝勒；杜尔伯特台吉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辉特台吉德济特、普尔普、克什克封为贝子；辉特台吉根敦札布、固木扎布，杜尔伯特台吉布颜特吉斯、孟克博罗特，和硕特台吉纳噶察封为公；杜尔伯特台吉乌巴什、伯勒克，辉特台吉伊什、克什克特封为头等台吉。

这份名单显示，最终获得封号的首领共计二十二，比预计的二十人多出二人，他们出自辉特、都尔伯特、和硕特三部。

1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六十四。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4页。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第468页。

4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六。

### （三）乾隆二十年九月，筵宴噶尔臧多尔济等

乾隆二十年，清军组成西、北两路大军征讨达瓦齐，六月将其俘获，平定准噶尔告一段落。此次，有绰罗斯台吉噶尔臧多尔济等首领归附<sup>1</sup>：

绰罗斯台吉噶尔臧多尔济、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台吉巴雅尔，着加恩各赏银五千两；台吉和通额默根、达瓦、布鲁尔各赏银一千五百两。

准噶尔旧有四卫喇特，今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噶尔臧多尔济封为绰罗斯汗、策凌封为都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札卜封为和硕特汗、巴雅尔封为辉特汗；台吉和通额默根、达瓦、布鲁尔封为公。

上述史事均与八幅油画像相关，为下一步考订具体时间、作者奠定了基础。

## 三 八幅油画像的作者、绘制时间

以往的研究，将这八幅油画肖像归于王致诚名下。王静灵对此提出异议，他通过对八幅作品风格类型的研究，认为它们应分为三种风格，也就是说出自三位画家的手笔。其中，《达瓦齐像》《达瓦像》为郎世宁；《根敦像》为艾启蒙；《策凌像》《巴图孟克像》《刚多尔济像》《额尔德尼像》《布颜特古斯像》为王致诚。八幅油画像非一人所绘，笔者也有同感，具体到每一件作品的作者，意见则有不同。

（一）王氏指出《达瓦齐像》《达瓦像》为郎世宁所画，笔者深表赞同，并为其补充材料如下：

1.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以下简称《造办处档案》）记载，《达瓦齐像》的绘制时间是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这与画面中达瓦齐所穿戴的夏季冠服完全相符。这一年，达瓦齐娶诚郡王允祉的孙女为妻，授多罗额駙<sup>2</sup>，画像的绘制或与此有关。作品描绘达瓦齐微笑瞬间状态，十分生动传神，在八幅画中水平最高。

2. 史料显示，达瓦齐只在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到过一次避暑山庄，之后一直居住在京城府邸，直到乾隆二十四年七月病逝。因此，《达瓦齐像》与其他首领像均画于避暑山庄不同，应画于北京。

3. 达瓦是乾隆二十年随噶尔臧多尔济归附的，并于同年九月下旬入觐，被封为公。其画像应画于乾隆二十年冬季。

4. 《达瓦齐像》《达瓦像》绘制完成后收藏在造办处的如意馆，并未题名。直到乾隆三十二年，才由皇帝下旨交军机处题写满汉官衔<sup>3</sup>。

（二）将《根敦像》的作者定为艾启蒙，笔者不认同。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列传》<sup>4</sup>，根敦，都尔伯特人，姓绰罗斯，车凌族弟，都尔伯特公巴图孟克之长子。乾隆十八年，从“三

1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百一十一，《达瓦齐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第848页。

4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之九十七，《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车凌”来归；十九年诏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年从西路军征达瓦齐，三十一年卒。显然，根敦是乾隆十九年五月跟随“三车凌”入觐的，且只有这一次，而此次宫廷派出的画画人只有王致诚一人。因此，《根敦像》毫无疑问应是王致诚的手笔，而不可能为艾启蒙。

（三）关于《都尔伯特汗策凌像》，笔者认为，其绘制时间及是否出自王致诚之手，仍有讨论的空间。策凌一生曾两次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九年五月，第二次是乾隆二十年九月下旬<sup>1</sup>。也就是在这次入觐时，被封为“都尔伯特汗”。因此，这幅题名为“都尔伯特汗策凌”像应画于乾隆二十年冬。画面中的策凌头戴毛皮暖帽，身穿毛皮领金龙四团石青亲王补服，很明显是冬季冠服，也与第二次入觐时的季节相符。此后，他没有再到过避暑山庄，并于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出痘身故。<sup>2</sup>如此看来，策凌一生曾画过两幅油画脸像，一幅是乾隆十九年“都尔伯特亲王”像，一幅是乾隆二十年“都尔伯特汗”像。前者为王致诚所绘，后者是否也出自其手，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关于《刚多尔济像》《额尔德尼像》《布颜特古斯像》的绘制时间与作者。三人虽属都尔伯特部，但并非与“三车凌”同时归附、入觐。据《扎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列传》<sup>3</sup>：

都尔伯特设正副盟长各三：从车凌至者，分左右翼，曰车凌，曰车凌乌巴什为盟长；曰色布腾、曰车凌孟克副之。从讷默库至者，别自为部，以讷默库为盟长，刚多尔济副之。

又，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可知，刚多尔济、额尔德尼和布颜特古斯同属讷默库部，于乾隆十九年十一月随阿睦尔撒纳、讷默库入觐，三人画像应画于乾隆十九年冬。此次接见活动的时间因为与祭天、皇太后庆寿日期相近而较为紧促，但乾隆皇帝还是派出了宫廷画家前来为阿睦尔撒纳等人画像。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丙子谕旨<sup>4</sup>：

本月恭祭天壇，并庆贺皇太后圣寿，驻蹕避暑山庄亦无多日。因欲加恩照车凌等之例图画尔等形象，特遣大臣带领画工前来。俟画竣，亦赏尔等带回。此旨并寄海望。

至于此次派出的画家，档案记载并不十分明确，只是说“西洋人郎世宁等”，王致诚、艾启蒙应均在其列，画像于翌年二月绘制完成。《造办处档案》乾隆二十年二月初六日“如意馆”<sup>5</sup>：

奉旨：西洋人郎世宁等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照先前画过脸像一样镶锦边。钦此。  
于本年三月十六日，副催总李文照将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分，镶得锦边，交如意馆。讫。

1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四，夏六月戊午，《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十三，《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十五，《扎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4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六，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

5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第297页。

从绘画风格判断,三幅画像肯定不是郎世宁手笔,应是另外二人中的一位,但究竟是出自哪一位,还有待进一步确定。此外,三幅画像还存在一个季节问题,即三人入觐是在冬季,画像却身着夏季补服,头戴凉帽。三人中额尔德尼、布颜特古斯来避暑山庄只此一次,没有再次被画像的可能。因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画家只画了脸像,后来补画衣帽时搞错了季节。为此类油画脸像补画衣帽,是比较常见的事。如《造办处档案》记载“现画油画脸像,着艾启蒙添画衣帽、盔甲”<sup>1</sup>。之所以会将三人的衣帽画错,可能因为他们与“三车凌”同属都尔伯特部,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综上所述,八幅油画像的作者和绘制时间,列表如下:

名称	作者	绘制时间
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根敦	王致诚	乾隆19年夏
都尔伯特公巴图孟克	王致诚	乾隆19年夏
都尔伯特札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	王致诚或艾启蒙	乾隆19年冬
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	王致诚或艾启蒙	乾隆19年冬
都尔伯特公布颜特古斯	王致诚或艾启蒙	乾隆19年冬
都尔伯特汗策凌	王致诚或郎世宁	乾隆20年冬
绰罗斯公达瓦	郎世宁	乾隆20年冬
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	郎世宁	乾隆21年4月

#### 四 乾隆十九年夏,王致诚画肖像的数量问题

王致诚此次绘制油画脸像的数量,史料说法不一。宫廷档案记载要画“十二副”;《钱德明神父致本会德·拉·图尔神父的信》记载,“给十一位刚刚获得荣誉的显贵画肖像”;同时又说,王致诚最终“画了22幅油画肖像”。初看起来,这三组数字似乎有些相互矛盾。但综合分析各种史料,就会发现档案所载、钱氏书信所述均不误,只是其中细节颇为曲折,如今已鲜为人知了,这需要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形,作合理的解释。

首先,《造办处档案》载皇帝要王致诚“往热河画油画十二副”,是在乾隆十九年五月初七日,这就牵涉到此次都尔伯特部受封首领前来热河觐见的具体人数。据《大清高宗实录》等多种史料记载,此次受封的主要首领共十三人,预计来避暑山庄觐见的应为十二人,缺席一人。此人名色布腾,被封为扎萨克多罗贝勒,其地位仅次于“三车凌”。色布腾未来入觐的原因是皇帝对其另有派遣。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色布腾列传》<sup>2</sup>:

乾隆十八年从三车凌来归,善约众,上知其材,将任之。十九年,诏参赞军务,偕内大臣萨拉尔议招乌梁海及扎哈沁。復以所部诸台吉避痘,谕色布腾驰至张家口外,命大学士公傅恒迎劳之。既而三车凌率诸台吉来朝。……如之时,色布腾归政,以议乌梁海务赴萨拉尔军。族台吉巴朗、蒙

<sup>1</sup>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第531页。

<sup>2</sup>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之九十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色布腾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克特穆尔等蓄叛志久，至是乘间挈众逃。是年冬，诏偕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入觐，……二十年，卒。

由此可知，色布腾此次并未随三车凌入觐。因此，乾隆皇帝五月初七日给王致诚下旨要画“十二副”肖像，不包括色布腾。

再看钱德明信中所说“给十一位刚刚获得荣誉的显贵画肖像”、最终“画了22幅油画肖像”。汤开建认为是为22位首领，每人画了一幅油画肖像，且是分两次完成，先画了11张，后又画11张<sup>1</sup>：“查《西域图志》，乾隆十九年五月的热河册封都尔伯特部的首领共二十二人，其名为：策凌、策凌乌巴什、伯什阿噶什、讷默库、策凌孟克、色布腾、巴图博罗特、刚尔多济、喇嘛札布、根敦、洛垒原端、额尔德尼、班珠尔、布图克森、孟克特穆尔、玛什巴图、乌巴什、达木巴都噶尔、巴图孟克、刚、布颜特古斯、孟克博多特。故知，王致诚为这22位都尔伯特部的首领每人都绘制了一幅油画肖像。”这里，汤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将历次册封的都尔伯特部首领都当做乾隆十九年五月册封。汤氏所引出自《西域图志》卷三十七，《封爵一，都尔伯特属》。在名单之前还有一段说明：“乾隆十八年冬，准噶尔都尔伯特部台吉策凌等率众内附。十九年五月觐于热河，诏封爵宴赉有差……。凡都尔伯特部先后受封及袭封者备登如左。”既然是“先后受封及袭封者”，当然不止乾隆十九年五月这一次。名单中讷默库、刚尔多济、洛垒原端、额尔德尼、布图克森、布颜特古斯等，都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随阿睦尔撒纳一起归附的，不可能出现在这次画像中。

笔者认为，钱德明信所云王致诚画了22幅油画肖像，并非为22位都尔伯特部首领“每人都绘制了一幅油画肖像”，而是为策凌等十一位首领，每人画了两幅肖像，一幅收藏宫廷，一幅赏给了本人。对此，史料有明确记载。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丙子朔上谕<sup>2</sup>：

谕军机大臣等：朕令海望图画车凌等像，携至避暑山庄。着寄信玉宝，即带阿睦尔撒纳至彼，令其识认。仍晓瑜伊等：皇上怜念尔等投诚，施恩画像。现在图画车凌等像，俟尔等回去之便，令讷默库带往，赏给伊等，传之子孙。

那么，宫廷档案记载的“十二位首领”怎么又变成了十一个人呢？这是因为有一位首领中途叛逃，此人名孟克特穆尔，被封为贝子。在前来朝觐的路上，他伙同“三车凌”之一的车凌孟克之子巴朗，中途反叛，逃回准噶尔。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扎萨克多罗郡王车凌孟克列传》<sup>3</sup>：

巴朗乃车凌孟克之次子，十九年从父内附入觐。中道谋窜，归准噶尔，族台吉蒙克特穆尔从之。二十年四月，擒获巴朗、蒙克特穆尔，命将军班第将二人解京献俘。二十年六月至京，上御午门行受俘礼，巴朗、蒙克特穆尔命刑部即行正法。

1 汤开建：《清宫画家法国耶稣会修士王致诚在华活动考述》，《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213页。

2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七十六，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

3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十六，《扎萨克多罗郡王车凌孟克列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孟克特穆尔中途反叛，显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皇帝在五月初七日要求画“十二副油画”时应尚不知晓。如此看来，此次最终来到避暑山庄的都尔伯特部首领只有十一位，他们是：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班珠尔、根敦、刚、巴图孟克、玛什巴图、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至此，钱德明书信中说王致诚“给十一位刚刚获得荣誉的显贵画肖像”和“最终画了22幅油画肖像”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 五 油画像的性质

关于这些油画像的性质，以往的研究均认为他们是为绘制正式作品而做的准备。如杨伯达在谈到《万树园赐宴图》的创作过程时说<sup>1</sup>：“弘历派遣王致诚赴热河画“三车凌”等油画肖像十二幅，为创作准部题材的绘画作准备。”聂崇正<sup>2</sup>：“这些油画肖像，应当是为绘制大幅的功臣像或其他主题性绘画而收集的素材，而不是正式在紫光阁内悬挂的作品，故而带有稿本性质。”聂先生还认为，这些油画像是画家“速写”而成，并不完善<sup>3</sup>：“油画的笔触都十分明显而且相当急促和粗放，颇类速写，看得出来绘制时较为短促且匆忙，没有时间慢慢细抠局部加以修饰而使之更加完善。”但从具体的画作来看，并不是所有油画像的“笔触都十分明显而且急促和粗放”，例如《达瓦齐像》《达瓦像》《策凌像》就画的十分细腻，不见笔触。可见，八幅油画像并非都是在“时间短促”的条件下完成的。某些作品的“笔触明显”“急促粗放”除时间因素外，还应与作者的艺术造诣和风格有关。

从本文前引《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丙子朔上谕》来看，这些画像都是由皇帝亲自下旨“加恩图画”，且一式两份，宫廷收贮一份，赏给本人一份。这样的画像显然不是稿本，而应是正式作品。经过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发现这些收贮于宫廷的准噶尔油画脸像被乾隆皇帝直接命名为“油画功臣像”，且从乾隆中期开始作为“功臣像”摆放在宫廷殿宇中，地点不在紫光阁，而是在武成殿。也就是说清代宫廷绘画创作中不仅有“紫光阁功臣像”，还应包括“武成殿功臣像”，而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没有被注意到。

## 六 武成殿功臣像

### （一）武成殿的功用

武成殿位于紫光阁后，乾隆二十五年，与紫光阁一起重新修葺。落成后的武成殿以抄手廊与紫光阁相联结，形成一个封闭院落。关于紫光阁内的陈列情况，史料记载详实充分，“紫光阁功臣像”也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取得了不少新成果。相比而言，武成殿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仅史料记载简略零星，研究者也少有关注。为此，笔者运用档案史料与绘画作品相结合的方法，对武成殿内的陈列情况作了认真细致的探究，发现与紫光阁一样，武成殿也是陈列与战争有关物品的场所。例如，乾隆四十年，两金川平定，

1 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

2 聂崇正：《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的油画》。

3 聂崇正：《再说清宫油画半身像》，《紫禁城》2013年第3期。

西征将军阿桂等将领所用德胜灵纛旗<sup>1</sup>、将士所用“皮锁子甲”“银火药筒”、宝剑、腰刀等都陈列于此。<sup>2</sup>此外，武成殿的另一项重要陈列，就是摆放“油画功臣像”。

## （二）武成殿功臣像的首创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开始筹划在武成殿摆放油画功臣像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sup>3</sup>：“如意馆收贮三次投降油画脸像，预备呈览。”“三次投降油画脸像”应指分别于乾隆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归降的准噶尔四卫拉特首领肖像。乾隆皇帝从中遴选了十八位，作为第一批摆放于武成殿的功臣像。《造办处档案》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广木作”<sup>4</sup>：

十八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油画功臣像十八副，传旨：将功臣像按次续配楠木匣盛装，得时摆武成殿。钦此。计开：

第一	达瓦齐	第二	策凌	第三	乌巴什
第四	策凌孟克	第五	刚多尔济	第六	额尔德尼
第七	云端	第八	根敦	第九	玛什巴图
第十	克什克	第十一	达瓦	第十二	特古斯
第十三	特公刚	第十四	巴图孟克	第十五	达什敦多卜
第十六	恭沙喇	第十七	巴朗	第十八	马木特

由此可知，柏林现藏油画像就是这份名单中的八幅。依次为：达瓦齐（第一）、策凌（第二）、刚多尔济（第五）、额尔德尼（第六）、根敦（第八）、达瓦（第十一）、特古斯（布颜特古斯）（第十二）、巴图孟克（第十四）。这些油画像从乾隆三十四年始，一直摆放在武成殿，直到清末被西方列强掠夺、散佚。从这份名单还可以看出，十八人中除达瓦齐、达瓦等少数几人之外，绝大多数都属都尔伯特部，显示出皇帝对该部的特殊眷顾。据史料记载，准噶尔各部虽然先后归附，但并不稳定，反叛时有发生。四卫拉特中只有都尔伯特部的“三车凌”、刚多尔济等首领，坚守初衷，始终如一。

## （三）入选武成殿功臣像的其他成员

分析史料及宫廷档案记载可知，武成殿油画功臣像除上述十八位准噶尔蒙古族首领外，至少还包括另外两部分成员。

1. 土尔扈特部首领。土尔扈特部原亦系准噶尔四卫拉特之一，“后与准噶尔绝，准噶尔别以辉特为四卫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9册，第293页，《阿文成公年谱》卷十七。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9册，第295页。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第848页。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2册，第368页。

拉特之一。”土尔扈特部后远走俄罗斯。乾隆三十六年，该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回归祖国，受到乾隆皇帝的盛情接待。同年，渥巴锡等十位主要首领来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按照十几年前接待“三车凌”的规格接待他们，命画工为他们画像，收藏武成殿<sup>1</sup>：

土尔扈特归后，“泽诏分新旧二部，各设札萨克……旧土尔扈特以渥巴锡领之，称汗如故。诸台吉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新土尔扈特以舍稜领之，封郡王，别授贝子一。复命工图其形，藏武成殿。

档案明确记载，为十位首领画像的是西洋画家艾启蒙，乾隆皇帝还明确要求“画二份，一份赏给，一份收贮”<sup>2</sup>。目前，这十位首领的油画像都存世。其中《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油画像》，现藏德国曼海姆“赖斯-恩格尔霍恩”博物馆；其余九件现身2012年香港拍卖。显然，这幅画像也应是清末从武成殿被掠走，流失海外的。

2. 清军将领。入选武成殿功臣像的清军将领，也经由皇帝亲自遴选。《造办处档案》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如意馆”<sup>3</sup>：

奉旨：策楞等十八人，著交军机处查明品级，著王儒学绘画。达瓦齐、达瓦、岳钟琪交军机处照功臣像缮写满汉官衔。其策楞等十八人绘画得时，亦交军机处照功臣像缮写满汉官衔。

策楞（？～1756），满洲镶黄旗人，钮钴禄氏。官至四川总督。受命平定准噶尔叛乱，历任定边左将军、定西将军。乾隆二十一年，因久不能擒获叛首阿睦尔撒纳，被定罪逮捕，回京途中遭准噶尔兵劫杀。

岳钟琪（1686～1754）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名将，康熙时西藏平乱、雍正时抚定青海。乾隆十三年以六十二岁高龄被重新起用，协助大将军傅恒平定大金川。

这条档案还显示，岳钟琪的油画脸像在此之前已经画就，策楞等人是在此之后才进行绘制的，而此时策楞已去世十多年。显然，他的脸像并不是照本人画的，绘制这些脸像的也不是西洋画家，而是郎世宁的中国徒弟王儒学。目前所知，已知姓名的清军将领只有策楞、岳钟琪，最终入选人数也没有找到明确记载，只是在《造办处档案》中发现一条与之相关的记载，依此做大致的推测。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如意馆”<sup>4</sup>：

两次投降厄鲁特、布勒古特（土尔扈特）、策楞等油画半身像三十八幅，俱脱落颜色，着如意馆收拾见新。

1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之一百，《土尔扈特部总传》之《渥巴锡传》，《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4册，第504页，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如意馆”。

3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0册，第848页。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0册，第175页。

由此可知,三部分功臣像总共 38 幅,前两部分入选人数比较清楚,即“厄鲁特”18 人、“土尔扈特”10 人。那么,最终入选武成殿功臣像的清军将领应为 10 人。此外,陈列于武成殿的功臣像可能不仅这 38 幅,与紫光阁功臣像一样,后期或还陆续补充进来。其最终究竟有多少幅,尚不十分清楚。这条档案还显示,目前存世的油画像并非当初的原始状态,在乾隆五十二年曾重新修饰过。

#### (四) 武成殿功臣像的政治待遇

显而易见,从人员构成来看,武成殿功臣像的政治地位明显低于紫光阁功臣像。紫光阁功臣像主要以清军方面功臣为主体,武成殿功臣像则主要以归附人员为主体,这一点在绘画方面亦有所反映。两相比较,二者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画种不同。紫光阁功臣像为绢本,绘制精细,尺幅巨大。通常纵一米五至一米八左右不等,横约 95 厘米;武成殿功臣像为纸本油画,尺寸纵 70 厘米,横 55 厘米左右。

第二,形制不同。紫光阁功臣像是全身画像;武成殿功臣像只是半身像,在宫廷档案中被称为“油画脸像”。

第三,重视程度不同。紫光阁功臣像均题写有像赞。其中,前五十功臣像由皇帝亲自做赞、题写,后五十功臣像命大臣做赞、题写;武成殿功臣像则没有题赞,只有题名,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像主的族属、爵位、姓名。

尽管如此,武成殿功臣像的历史意义仍不可忽视,它表现出乾隆皇帝政治心胸的宽广与包容。事实证明,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均收到了预期效果。

### 七 武成殿功臣像与《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之人物关系

《万树园赐宴图》和《马术图》是记录筵宴准部首领的重要纪实性绘画。对此,杨伯达先生有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他认为,二幅画同绘于乾隆二十年七月,《万树园赐宴图》描绘的是筵宴“三车凌”等人的场景;《马术图》描绘的是筵宴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场景。二图由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三位“西洋画画人”合画,《马术图》的主要绘制者、属款者为郎世宁,《万树园赐宴》的主要绘制者、属款者应为王致诚<sup>1</sup>。此外,他还对画中所绘准部首领的身份做了尽可能的辨别,有利于我们理解作品的内容和绘制宗旨。但囿于材料的限制,有些未能完全坐实,有些还值得商榷。对此,笔者依据八幅油画像,结合相关史料的考证,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对两幅画作中准噶尔首领的身份做进一步探讨。

#### (一) 《万树园赐宴图》

在《〈万树园赐宴图〉考析》一文中,杨氏通过对画幅中准部首领所穿补服的考察,确定主要受封者,从右首起前三人为“三车凌”,即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第四人身穿行龙二团补服为

<sup>1</sup> 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12期,第3页。《关于〈马术图〉题材的考订》,《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关于〈马术图〉题材的再考订》,《文物》1983年第7期,第64页。



图 9-1 《万树园赐宴图》所绘准噶尔首领  
右起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根敦



图 9-2 《万树园赐宴图》所绘准噶尔首领  
右起第二人为巴图孟克

贝子孟克特穆尔，第五、六、七三人身穿正蟒二方补服分别为刚、巴图孟克和玛什巴图〔图 9〕。据此，画面中缺少贝勒色布腾、贝子班珠尔、根敦。至于其中缘由，他认为“如今很难理解”<sup>1</sup>：

画家为什么少画了贝勒、贝子共三人，而把册封为公的三人则毫无遗漏地全部画上，这可能是乾隆皇帝授意的。究其原因，如今很难理解。因没有资料不便作任何推测，留待今后研究。

对此，笔者通过对多种史料的梳理分析，发现并非画家漏画了三人，而是另有原因。据本文第四部分的考证，贝勒色布腾此次没有跟随策凌入觐，贝子孟克特穆尔在入觐途中反叛，二人当然不可能出现在画面上。因此排在第四位，身穿贝子补服的不可能是孟克特穆尔，只能是根敦或班珠尔。又，以现存根敦的油画脸像与图中形象相对比，二者应为一。而班珠尔之所以没有被画上，或与其在此图绘制前已经去世有关。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班珠尔，车凌族子，十八年归，十九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年，所部诸台吉咸从大军征达瓦齐，班珠尔以疾不获从，寻卒。”班珠尔不仅没有出现在《万树园赐宴图》的画面上，也没有被乾隆皇帝选入功臣像之列。第五至第七位是三位辅国公，存有“油画脸像”的只有巴图孟克，经过仔细比对，第七位应该是巴图孟克。另外两位中究竟哪一位是刚，哪一位是玛什巴图，尚无法认定。第八至第十人，身着一品武职麒麟补服，应该是被封为扎萨克一等台吉的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和巴尔<sup>2</sup>，但具体人物身份一时还无法对应。《万树园赐宴图》所绘前十位都尔伯特部首领，全部出现在武成殿功臣像的名单中。

## （二）《马术图》

关于《马术图》中所绘准部首领，即方阵前排十一人（方阵之外二人系清朝官员）〔图 10〕，杨伯达曾发表《关于〈马术图〉题材的考订》《再考订》两篇文章，详细考订。但最终认为：

由于目前所见《清档》及其他史籍的不足，要具体考订《马术图》上的人物是有困难的，还是有若干矛盾未能得到解决。例如：《马术图》上的主要受封官员为十一人（即方阵前排所立者），这

1 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12期，第14页。

2 此人在档案文献中也写作“巴拉”或“巴朗”，应为音译所致。



图 10-1 《马术图》所绘准噶尔首领  
右起阿睦尔撒纳、讷默库、刚多尔济，第五人为额尔德尼



图 10-2 《马术图》  
右起第一人为罗金云端，第四人为布颜特古斯

个数目接近五月册封的十一人，而与十一月册封的十八人相差较多。类似的问题，有待今后继续讨论研究。

关于《马术图》所绘准部首领与册封人数相差较多的问题。笔者了解到的史料显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历次准噶尔各部受封人员并不是全部都来到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如乾隆十九年五月，就缺少贝勒色布腾、贝子孟克特穆尔。也就是说，只有前来入觐的首领才有可能被画像，出现在画作上。因此《万树园赐宴图》上没有画色布腾和孟克特穆尔，并不足奇。同样，《马术图》所画这十一个人，应该是跟随阿睦尔撒纳前来入觐的主要受封首领。《造办处档案》记载“郎世宁等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就应是《马术图》前排所画十一位首领。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考订图中人物身份至关重要。另外，此次归降的首领并不像前次那样同属一部，而是分属于辉特、和硕特、都尔伯特三部，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其次，此次主要受封人员后来反叛者甚多，史料中缺少他们的传记可供参考，这些都为确定图中人物身份增加了难度。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是依据画中人物服饰确定品级。对此，杨伯达先生的研究已经有明确结论：“右起第一人身穿金龙四团石青亲王补服，第二人身穿行龙四团郡王补服，第三、四人身穿正蟒二团贝勒补服，第五至七人身穿行蟒二团贝子补服，第八至十一人身穿正蟒二方辅国公补服。”然后再结合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逐一作具体考证。

第一人身穿亲王补服。据史料记载，这次册封的亲王只有阿睦尔撒纳一人，因此，右起第一人当为阿睦尔撒纳无疑。

第二人是一位年轻的郡王。此次册封郡王有两位，即都尔伯特台吉讷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笔者认为此人应是讷默库。因为据史料记载，班珠尔此次未来入觐<sup>1</sup>。《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

乙酉，上启銮幸避暑山庄，是日，驻蹕密云县行宫。丙戌，驻蹕常山峪行宫。丁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都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率众于广仁岭恭迎圣驾。

<sup>1</sup> 《钦定热河志》：“戊子，上至避暑山庄，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都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率众于广仁岭恭迎圣驾。”增加了班珠尔，误。

《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二十年九月，定北大将军班第疏奏<sup>1</sup>：

臣等公同酌议，派亲王策凌、策凌乌巴什、讷默库等，同去年未经入觐之亲王班珠尔等五人前赴热河入觐。

班第所说的“亲王班珠尔”就是“郡王班珠尔”，其于乾隆二十年五月晋封为亲王。由此可知，乾隆十九年十一月，班珠尔确实未来避暑山庄入觐。

其次，此人相貌非常年轻，也与讷默库相吻合。据乾隆十九年八月的一道谕旨<sup>2</sup>：

今思车凌乌巴什、讷默库俱属年幼，车凌孟克系旧人，经历事务，若遣往西路，于事有益。著将车凌孟克遣往西路，在参赞大臣上行走。车凌乌巴什、讷默库著照车凌孟克一体在参赞大臣上行走。

车凌乌巴什归附时年二十五岁，推测讷默库的年龄应与其相仿。

第三、四人身穿贝勒补服。此次封贝勒共四人，分别为都尔伯特台吉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辉特台吉扎木参、齐木库尔。其中，刚多尔济的油画像尚存，与《马术图》相比对，第三人应为刚多尔济。其在武成殿功臣像中名列第五，仅次于“三车凌”。至于第四人，据史料记载，齐木库尔此次未来觐见，可以排除。此人只能是扎木参或巴图博罗特。

第五至七人身穿贝子补服。此次封贝子共六人：都尔伯特台吉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垒云端，辉特台吉德济特、普尔普、克什克。其中，额尔德尼的油画像尚存，他的相貌特征是鼻子的右侧残缺，《马术图》第五人正符合这一特征，毫无疑问应为额尔德尼。第六人的身份，笔者推测应是罗垒云端。受封贝子的六人中，布图克森、罗垒云端、额尔德尼与贝勒刚多尔济是亲兄弟。四人中以布图克森为长，次罗垒云端、次刚多尔济、次额尔德尼。观察第六人的相貌与刚多尔济十分相似，应是其另外两兄弟即布图克森或罗垒云端中的一位。又，兄弟四人除布图克森外，均被列入武成殿功臣像中，分别排在第五、第六、第七位。布图克森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很可能是其没有来热河入觐，因此没有画像。第七人应是辉特台吉德济特、普尔普、克什克三人中的一位，三人也是兄弟关系，属阿睦尔撒纳部下。史料显示，克什克因病未来入觐，其应是德济特、普尔普二人中的一位。

第八至十一人身穿辅国公补服。此次封为公者五人：辉特台吉根敦札布、固木扎布，都尔伯特台吉布颜特古斯、孟克博罗特，和硕特台吉纳噶察。五人中只有布颜特古斯入选武成殿功臣像，而且有油画肖像传世。二者相较，第九位应为布颜特古斯。另外三人的身份尚无法确定。

1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一，乾隆十九年八月下。

### （三）关于《马术图》所绘马伎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乾隆十九年热河入觐时是否有马伎表演，曾经影响到对《马术图》内容的认定。因此，杨伯达在《关于〈马术图〉题材的再考订》的第五部分，进行了专门讨论：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一月两次接见、册封准噶尔官员，《钦定热河志》备记其盛，但两次都未提及马伎。马伎正式承应于宴飨藩部王公大臣的记载，始见于乾隆二十二年秋左部哈萨克汗阿布赉使根扎噶喇等来朝时，癸卯弘历“御万树园赐观火戏立马伎”。但是，既然《马术图》上款明晰，……我们自然应该据此图以补文献的疏漏，而不能因文献失载而怀疑图画之可靠。

《钦定热河志》对历次准噶尔首领的入觐活动确实有较详备的记载，但也不乏疏漏和舛误。以《马术图》所绘马伎表演为例，乾隆皇帝在筵宴“三车凌”诗中就有明确记载。《御制诗集》二集卷五十，甲戌（十九年），《万树园》诗序：“今年，都尔伯特部长入觐，即园中张穹幕，集名藩，赐宴、烧灯，陈马伎、火戏，燕乐之为时盛事。”诗序所述“今年，都尔伯特部长入觐”，应指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车凌”入觐，可见已经有马伎表演。因此，在此后描绘筵宴阿睦尔撒纳等人的绘画作品中选择观看马伎表演的题材，当无疑议。

## 八 结 语

以上本文用了较大篇幅，对柏林藏八幅油画像以及相关问题做了全面详细的讨论，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 明确指出八幅油画像中只有《根敦像》《巴图孟克像》是王致诚的作品，并为王静灵《达瓦齐像》《达瓦》像为郎世宁所绘之结论提供了佐证材料。四件作品作者的认定，对于认识郎世宁、王致诚油画肖像的艺术风格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确定传世清宫油画肖像的作者提供了重要参照。此外，对八幅油画像的人物身份、绘制时间以及性质等问题做了着重讨论，均得出确切结论。

2. 重新梳理出“武成殿功臣像”。指出准噶尔蒙古族首领达瓦齐、策凌等十八人是最早入选武成殿的功臣，现藏德国的八幅油画像就是其中的八位。并对“武成殿功臣像”的摆放时间、入选人员、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清代“功臣像”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发掘、研究这些形象史学资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的了解这段历史不无帮助。

3. 详细讨论了武成殿功臣像与《万树园赐宴图》《马术图》所绘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八幅油画像、各种史料记载的分析，对二图所绘准部首领的身份做了逐一辨识，基本厘清了他们的身份，为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研究过程中，还接触到一些史料，或多或少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有所关联，在此提出三点。

第一，紫光阁功臣像手卷为“小稿本”问题

聂崇正先生认为，手卷稿是绘制立轴之前，送皇帝审阅的“小稿本”。王静灵对此表示赞同<sup>1</sup>：“聂崇正先

<sup>1</sup> 王静灵：《柏林收藏的紫光阁功臣像及其相关作品新论》，《故宫学术季刊》，第34卷，第1期，2016年，第170页。

生认为手卷形制的紫光阁功臣像是在制作用以悬挂于紫光阁殿堂内的立轴正图前，呈给乾隆皇帝审阅的小稿本或小样的说法，是非常合理的。”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从目前尚且存世的《平定准部回部前五十功臣像卷》《平定台湾前二十功臣像卷》来看，这些手卷均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且都有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像赞及序文。显然，这样的手卷不应该是“小稿本”或“小样”，而应是正式作品。不仅如此，史料还显示，此类手卷是清代功臣像中最高等级制作，只有位列前五十的功臣才享此殊荣。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六月辛亥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等奏，绘画功臣图像，现在陆续进呈，并将已画、未画及行文查取小像各员，分别开单呈览。自应如此办理。至另片所奏行文明亮处咨取各土司土舍等图像一单，其事殊有关系。……且此等土司，列在后五十功臣，非若前五十功臣，另须绘画成卷、亲书像赞者可比。

## 第二，部分油画脸像并非照本人绘制

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绘制前本人就已故去。据《造办处档案》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记事录”<sup>1</sup>：

着丰升额、英廉照管西洋人艾启蒙、潘廷章在京内造办处画功臣像，其应画之人着丰升额传赴前来。再，已故者着丰升额查看面貌相对者绘画。

另一类是人虽在世，但照本人绘制有时空难度，遵照皇帝的旨意照面貌相似者绘制。如前引《上谕》中的土司像，皇帝就指示“即当就在京所有番众内择其约略相似者，指示画工，令其绘像，备数足矣。”现藏柏林油画像中就有此类“土司”像。

## 第三，油画脸像的作者、题材范围、数量

毫无疑问，油画脸像的主要作者是郎世宁等西洋画家。此外，中国画家也参与了部分脸像的绘制。如乾隆三十二年，就命郎世宁学生王儒学画策楞等清军将领脸像，至于画像的比例有多少，尚有待进一步考察。作品的绘制范围，除了比较熟知的皇帝及皇室成员、王公外藩及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之外，还应包括西洋使节以及服务内廷的西洋画家、匠人。例如，《造办处档案》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如意馆”<sup>2</sup>：

谐奇趣东平堂九屏风背后现帖西洋来使把（巴）哲格脸像，着郎世宁查在京出力多年，有画过脸像西洋人配画十七个。

二月二十四日，郎世宁查得现有画过脸像西洋人十四个，呈览。奉旨：着十四人之内拣（减）去三个，将现在内廷行走郎世宁等六十（人）画上。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9册，第427页。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第378页。

“油画脸像”的数量应该说相当可观，粗略统计，至少在五百幅以上。因为有时皇帝一道旨意就要求画一百个。如《造办处档案》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如意馆”<sup>1</sup>：“油画功臣像一百幅，着配做楠木罩盖匣一个。”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如意馆”<sup>2</sup>：“着西洋人艾启蒙、贺清泰、潘廷章画油画脸像一百个。”再有，钱德明神父信中也有皇帝要求王致诚画 200 个油画脸像的记述。

遗憾的是，这些油画像的主要收藏地点是圆明园的如意馆和紫光阁后的武成殿，这两处后来都是遭西方列强掠夺、破坏的重灾区。就此，乾隆皇帝苦心经营的数百幅油画像毁失殆尽。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

1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30 册，第 848 页。

2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 39 册，第 785 页。